

霍布斯鲍姆对历史唯物主义史学方法论的探索

冯 潇

【摘 要】霍布斯鲍姆是当代最具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他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与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的成员一道,总结出一套以自下而上的历史观和阶级斗争分析方法为核心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方法,但在关于方法论的具体理解上,他与E.P.汤普森存在一定差别。同时,霍布斯鲍姆与年鉴学派的布罗代尔基于共同的研究旨趣,试图打破“独断的结构”,扩大历史学研究的视野,突出普通人民在历史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推进20世纪史学研究方法的现代性转向。在此基础上,霍布斯鲍姆回应现实需要,将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运用于世界近现代史的重新建构之中,通过史学作品的大众化传播,打破西方中心论的刻板模式,令读者能够广泛接受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他较好地处理了政治立场与学术立场之间的关系,发掘并践行了具体的、可传播的历史唯物主义史学研究方法,重视学术研究的大众化普及,由此奠定了他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领域的重要地位,并对我们今天的学术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 键 词】历史唯物主义史学方法论;阶级斗争分析方法;自下而上的历史观;史学现代性

【作者简介】冯潇,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南京 210004)。

【原文出处】《学海》(南京),2023.6.201~210

霍布斯鲍姆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的身份被授予了“左翼近代史大师”的美誉,并被认为是当代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值得思考的是,无论是相比于同时期法国的布罗代尔,抑或是同属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E. P. 汤普森,霍布斯鲍姆的研究无论在学理阐发的深入性还是概念体系建构的严密性上都稍逊一筹,那么他为什么却能获得如此殊荣呢?综观其一生的学术创建,霍布斯鲍姆始终以旺盛的精力投入学术创作,进入耄耋之年仍笔耕不辍,产生了持久的学术影响力,这是他能为人广泛知晓的重要原因之一。但真正将霍布斯鲍姆引向学术高位的,是他对于史学方法论转向的准确把握。习近平同志曾指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我们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总钥匙’。”^①在世界历史模式发生重大转向之际,霍布斯鲍姆把握住了历史研究方法的现代化转型这一“总钥匙”,才是他获得成功的关键。他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探索并发展出一套具体的、可传播的历史唯物主义史学方法论,将其运用于对世界近现代史的系统性重绘当中,也在这一过程中证明了自身方法论的科学性与

合理性。从内部理论建构而言,霍布斯鲍姆的研究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清晰梳理出了一条不同于以往的世界历史解释模式,作为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中的一员,他与法国年鉴学派一道,共同推动了20世纪史学的现代化发展。从外部实践运用来说,霍布斯鲍姆长期关注现实,与种种非马克思主义或庸俗化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研究展开长期论战,在辨明真理的过程中,发展出一种广为大众接受和认可的对于世界近现代史的马克思主义解释模式。

霍布斯鲍姆与汤普森:实践历史唯物主义史学研究方法

作为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的一员,霍布斯鲍姆与他的同事们最为关注的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的具体化问题。学者们在研究之初就认识到,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门科学的方法论,在具体的历史分析中切不可陷入教条主义的框框,而是要正确全面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将其与社会的现实状况相结合,总结出一套具体的、可传播的史学研究方法,以此对世界历史做科学、合理的解释与分析。与此同时学者们也敏锐地看到,要探索出具体方法

论,首先就要确定具体的研究对象。英国作为工业革命的发源地,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中具有重要的典范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讲,赢得了对于英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的解释权,也就掌握了评述总体的近现代世界发展史的主动权。由此,学者们在凝聚共识的同时,结合自己的研究方向,开启历史唯物主义史学研究方法具体化的探索之路。

从总的方面讲,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结合英国本土发展特点,将历史唯物主义的史学方法论概括为自下而上的历史观和阶级斗争分析方法,将其作为研究英国历史乃至整体世界发展史的一种具有共识性的研究方法。哈维·凯伊认为,“以阶级斗争分析方法为核心的阶级决定论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三大集体贡献之一”。^②彼得·伯克进一步指出,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的理论传统就在于用“‘阶级斗争分析方法’和‘自下而上的历史观’来寻求重新建构历史研究和历史理论”。^③经过组织化的探索与实践,这种具体化的史学研究方法逐渐发展成为一种适合英国本土的、行之有效的历史唯物主义史学研究方法。

自下而上的历史观深刻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对于史学研究带来的变革。霍布斯鲍姆提倡“恢复底层人民的理论天赋”,认为以往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于历史观方法的改造并不彻底,“比较喜欢研究的主题并不是平民,而是平民当中那些堪作为劳工运动祖师爷的人;并不是研究像宪章运动者、工会主义者、好战的劳工运动者这些人”,^④这种做法虽然将研究视角下移至平民阶层,但采用的仍然是传统的“自上而下”的研究方式。即是说,从理论的研究范畴来讲确实有所拓展,但没有引发历史观的深刻变革,真正意义上的属于普通人民的历史研究方式并没有形成。因此霍布斯鲍姆强调,不仅要有视线的下移,更要有方法的倒转。具体而言体现在如下两点。其一,自下而上的历史观是运用唯物辩证法来实现方法论转换。新的历史学研究方法对于传统方法论的颠覆不仅体现在研究对象的不同,还在于旧有的许多研究技术也要随之更新。过去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采用自然科学的概念、方法和模型进行社会研究,有其可取之处,但若将之机械地照搬到新的历史研

究领域,则暴露出不可忽视的短板,因为在新的底层史学研究中,普通人的日常经历没有被严谨地以文字的方式记录下来,传统方法论难以真正触及对平民大众的真实研究。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与实证主义方法论最大的区别在于它是一种辩证的思维方法,既注重客观性和即时性,又强调发展性和总体性。自下而上的历史学方法论对辩证法的强调使它能够冲破实证主义的局限性,在尊重事实经验的同时超越这些琐碎而片面的记忆证据,从总体的社会关系的角度研究历史,运用总体性的思维将各种片段的资料整合起来,在把握到这些记忆证据所反映出的各种社会关系及社会形式的内容来还原历史真相的同时,尝试达到对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揭示。其二,自下而上的历史观是一种批判性的分析方法。传统的自上而下的史学研究将上层精英作为研究对象,就意味着其立场及研究方法是以肯定性和陈述性为主的,这种方法构建了一种“独断的结构”,^⑤在这个结构当中,掌握权力的上层群体对于历史的贡献是积极、主动以及理性的,而平民却是一盘散沙式的、被动的、非理性的,因此现有的结构是稳定合理的,即使上层精英的暂时失误导致了较为严重的影响社会稳定的事件,依然需要通过精英层的自我调整来加以解决。如此,从大的时间线上看,历史只是时段的一次又一次重复。自下而上的历史观强调要从底层人民的角度真实还原历史。由于平民的生活与思想是一个未知的没有被充分记载的领域,因此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就是对未知的探索和揭露,它必然不会是以肯定或陈述性的方式来完成,“真实的分析必然具有批判性”。^⑥

阶级斗争分析方法是跳出静态的、狭隘庸俗的经济决定论视域,转而动态地分析社会历史的重要方法。这一研究方法的开创者是莫里斯·多布,他在1937年的《阶级冲突的经济基础》以及1946年的《资本主义的发展研究》中尝试运用阶级斗争分析方法讨论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过渡发展问题。在此基础上,学派成员共同合作,基于对马克思文本的理解,认为阶级斗争分析方法具有以下特点。其一,阶级斗争分析方法是研究资本主义发展史的基本方法。资本主义发展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在资本

主义社会当中,无产阶级占社会成员的大多数并具有最彻底的革命意识,国家内部的一切斗争形式的实质是各个阶级之间的斗争。当一个阶级在展开革命斗争的过程当中,“仅就它对抗另一个阶级而言,从一开始就不是作为一个阶级,而是作为全社会的代表出现的;它以社会全体群众的姿态反对唯一的统治阶级”。^⑦其二,阶级斗争分析方法以动态的、主体性的方式研究社会历史。一方面,阶级内部具有分化和层级化,但这种分层是处于不断变动之中的,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阶级内的成员会随之发生变化,以劳工贵族为例,这一群体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就从小资产阶级逐渐转变为无产阶级。另一方面,以工人阶级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具有主动性,若在根本上否定了工人阶级的主动性,就是忽视他们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的贡献。^⑧其三,阶级斗争分析方法是一个综合性的研究方法。阶级是由重重关系构成的系统,既有时间系统的因素影响,也与空间系统有关,同时阶级不是凭空出现的,它必然是与总体的社会生产方式相关联的,社会生产方式的巨大变化带来的是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因此无法剔除掉与之相关的综合性因素来孤立地展开阶级领域的研究。

但在具体的关于方法论的理解方面,学派内成员在秉持共性的同时也存在差异,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霍布斯鲍姆和E.P.汤普森。他们二者被共同看作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领域的代表人物,因观点相似、立场相近而被一并列为第一代英国新左派。然而,1956年前后的一系列危机导致汤普森等人陆续退党,霍布斯鲍姆坚定地选择留在党内,政治立场的不同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他在学术取向上与昔日战友产生分歧。比较分析霍布斯鲍姆与汤普森的学术关系,可以更加清晰地勾勒出霍布斯鲍姆史学研究方法论的探索轨迹。

第一,研究取向不同。霍布斯鲍姆的研究在于用历史学的研究方式对唯物史观给予更加清晰的阐释,汤普森则基于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开创出自己的理论。汤普森一直认为,所谓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要在马克思开创的理论传统中从事创造性工作的人,^⑨因此他的研究注重创新性及批判性,不拘泥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如他于1957年在《新思想者》

杂志发表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致非利士人书》中,^⑩就对斯大林主义展开了系统深入的批判。与汤普森相比,霍布斯鲍姆的研究没有那么锋芒毕露,他意识到马克思的理论在当下确实出现了一些需要发展和调整的内容,但他并未跃出理论边界,而是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来指导和发展自己的史学研究。他撰写了多篇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解读性文章,强调要始终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内来谈论历史,“不回头去谈马克思,或说得更清楚些,不从马克思开始谈的地方谈起,那么对历史的讨论就会不够严谨”。^⑪

第二,霍布斯鲍姆更加强调经济基础对于历史发展的推动作用,汤普森更倾向于从上层建筑的角度来展开研究。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这一代表性作品中,汤普森一再强调生产方式对于工人阶级形成所具有的决定性作用,而文化在工人阶级从自在向自为转变的过程中起核心作用,“阶级是社会与文化的形成,其产生的过程只有当它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自我形成时才能考察,若非如此看待阶级,就不可能理解阶级”。^⑫与汤普森不同,霍布斯鲍姆更加强调经济基础在阶级的形成及发展中的作用。他在分析工人阶级生活状况,以及更为细致的劳工贵族的发展转向过程时,都十分重视对经济数据的考证,以之为线索,对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展开论证。但值得一提的是,两位学者的研究侧重点有所不同,却并不相互排斥。作为学术共同体的成员,汤普森的理论研究中不乏对于经济、社会等的观察,霍布斯鲍姆则将对文化的关注拓展至爵士乐的理论分析当中。

第三,对阶级以及阶级斗争的理解有所不同。他们关于工人阶级出现的时间界定及其对历史发生的作用理解有所不同,导致他们在关于资本主义发展史方面的时间界定产生分歧。汤普森将工人阶级在英国社会出现的时间定在了19世纪初期,认为18世纪早中期“英国没有阶级的阶级斗争”。霍布斯鲍姆倾向于将工人阶级的形成时期放在19世纪中期即宪章运动之后。他专门就人民宪章运动的定义来说明这一问题。霍布斯鲍姆认可汤普森对于英国工人出现时代的判断,因为在宪章主义时代,就呈现出地主、资产阶级、工人三足鼎立的状态。但是霍布斯鲍

姆对于何为工人阶级做了较为具体的定义。在他看来,当其他国家的农民、小资产阶级、小型工匠之类的角色仍占社会群体的规模很大,仍对社会生产发挥重要作用的时候,英国的这部分人应不再作为个体,而是作为产业工人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汤普森将宪章运动之前的工匠群体与之后的工人阶级等同起来的观点显然是无法令人信服的。^⑬

总之,霍布斯鲍姆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史学研究方法论的探索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研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非个人的理论独创。但由于研究旨趣、对象及立场的不同,在具体的对于方法论的理解和实践上学派成员间亦存在差异。

霍布斯鲍姆与布罗代尔:打破“独断的结构”

事实上在同一时期,关于史学研究现代性的讨论并非仅仅发生在英国,而是蔓延于整个发达资本主义世界,这是与当时的社会发展需要直接相关的。“二元革命”在带来生产方式革命性变化的同时,也呼唤并带动了思想领域的革新,催生了兰克史学的新发展,并为之后史学研究的现代性转向奠定了基础。人在认识到自然科学具有的伟大力量的同时,也逐渐对科学本身产生崇拜和信仰,兰克倡导“如实直书”的科学研究方法,要求用权威的论据去复原“真实”的政治历史,带动了历史学专业化的建立。^⑭这种方法论的革新对于当时的史学界来说是具有颠覆性的。然而亦如伊格尔斯所言,自古希腊之后,“历史学家们在研究和撰写历史的方法中有一种高度的连续性”,历史的解释取决于精英阶层的意识动机,“渗透在历史著作中的实际上是贵族的观点”。^⑮虽然兰克史学倡导“通过‘科学’地寻找史料、鉴别史料和使用史料,就能够复原过去,写出真实的历史”,^⑯但直到19世纪上半叶,这种自上而下观察并记录历史的“连续性”从未断裂。也因此,确如霍布斯鲍姆在评价兰克对于历史学研究的影响时所说,这一史学方法论过多地贴近自然科学的潮流,采用了实证主义的做法,致使其研究结果成了文献的积累或是固有观念的重复。面对一个亟待被重新建构和解释的世界,兰克史学的局限性以及对史学自身发展的阻碍性正日益暴露,学者们需要冲破藩篱,寻找更适应于历史发展需要的新的研究方法。

兰克以后,历史学的概念被不断拓展,出现了三种研究倾向:一是政治史和宗教史急速衰退,社会经济史明显升温;二是人们十分谨慎地使用“观念”作为历史的解释;三是历史学家更乐于用社会普遍的方式来解释历史,而非从个体的行动来看待历史事件。^⑰其中,最能够代表现代社会史发展方向的是法国年鉴学派的研究方式以及现代马克思主义史学。^⑱这一方面是由于,二者是当时反对传统史学研究模式的主力军,认为世界历史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并不存在单一的必须被效仿的解释模式;另一方面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二者都关注到社会中的有自觉意识的人类活动在历史发展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就总体而言,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与年鉴学派在研究方法上互有影响。在年鉴学派的众多学者之中,霍布斯鲍姆最欣赏布罗代尔的学术创建,并将年鉴学派对于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所具有的影响力都归功于布罗代尔。^⑲事实上,虽然二人分属不同学派,在意识形态方面有着不同取向,但基于共同的研究旨趣,即打破“独断的结构”、寻找现代化史学发展新方向这一目标,他们的研究在一些重要领域就具有共通性和可比较性。这种微妙的学术关联在他们各自撰写的同名著作《论历史》中得到了较为清晰的呈现。

第一,两位学者积极探寻新角度,期望通过结构性的改变推动20世纪史学的现代化发展。布罗代尔强调对历史时间的重新理解,主张用长时段的方式来理解历史。霍布斯鲍姆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出发,在限定资本主义发展史研究时段的同时,认为马克思的优点就在于“他同时考虑了社会结构的存在以及历史性,或者换句话说,就是内在的动态变化”,^⑳通过对空间维度的转换,探索出了一种现代化的史学研究方法。具体而言,布罗代尔并不讳言马克思对自己的影响,还将这种从长时段维度解释社会历史模式的首创权归于马克思。^㉑在他看来,长时段并不等同于数学时间,而是一个漫长阶段内各种社会因素组合而成的复杂的关系结构,单一的历史由此变得丰富,“从短时段转向较长时段,然后转向深远的视域,这时就可以重新思考一切,重新建构周围的一切”,^㉒也由此,历史不再仅由单一的事件组

成,其前后的发展在长时段上具有了因果联系,也就具有了“用现在解释过去”以及“用过去解释现在”的可能性。霍布斯鲍姆则认为“马克思主义对于史学的现代化扮演着极重要的角色”,^②他将这一现代性方法论的核心概括为以政治经济学研究为基础以及阶级概念的引入。历史唯物主义通过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动态模式,赋予了从空间维度研究历史的可能性,历史不再是单一线性的,在空间维度下的社会历史结构是动态的、生成性的,历史是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下向前发展的,由此,人们看待历史、思考历史的角度发生了全新变化。在此基础上霍布斯鲍姆进一步指出,自工业革命以来,工人阶级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主体,也就是推动资本主义历史向前发展的主体。如恩格斯在解释唯物史观时说:“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及其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确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的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③在这个过程当中,人的主体性得到彰显,历史走向从长期看的确是进步的,但这种进步处在一种动态的、反复的状态当中,这也是由人的社会发展的属性所决定的。正是在这一前提下,才具有自下而上看待历史,建构一个在观念上具有逻辑贯穿性的模型,在赋予历史变化性的同时实现历史研究的新突破的可能性。^④

第二,二者都试图寻找一种科学的“模式”来扩大历史学研究的视野,但对“综合”的理解不同。两位学者都强调要打破人文学科的界限,将包括社会学、民族学、经济学等内容纳入历史学研究范畴。霍布斯鲍姆认为,英国的文化优势就在于有许多专家在各个领域撰写了兼具专业性与大众性的著作,使文化得以传播和延续;历史学的研究也应当如此,不应仅仅为历史学或者说历史学者服务,而需要博众家所长,为大众服务。^⑤他认为,要继承和发扬马克思将哲学与社会科学联系起来展开综合性研究的传统,学术研究要立足英国本土的现实社会,在“理论型”和“应用型”的史学研究中,更多地发挥应用型研究的作用,从而实现综合性学科知识为历史学所用,

历史学研究为大众服务的目的。布罗代尔同样认识到打破学科壁垒,建立综合性研究的必要性,并且相比于霍布斯鲍姆,他更加看重学科尤其是人文学科的多样性,力图能摸索出一种包容各个学科的,尽可能脱离特殊性的普遍的历史研究模式。

但在关于综合模式的探索中,两位学者的取向有所不同。从他们的同名著作《论历史》中可以看出,霍布斯鲍姆重点讨论了历史与社会学、经济学之间的关系,布罗代尔则试图将各个学科都与历史学的研究串联起来。布罗代尔事实上也注意到了马克思主义以政治经济学研究为基础的历史学研究方式,但他认为这仅仅是众多“模式化”方式中的一种,而非唯一也不是最重要的模式。^⑥他的研究目标是要“囊括所有经典人文科学”。但是,布罗代尔这种综合性的研究方法由于缺乏一条一以贯之的主线,使得自身研究似乎失去了立场,他也坦言:“在我们积极地进行研究时,任何一个问题都变得越来越复杂;范围扩大了,深度增加了,新的工作领域层出不穷。”^⑦作为马克思主义者,霍布斯鲍姆认识到了以学科交叉的方式推动史学综合性发展的必要性,但他认为这种综合是建立在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基础之上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表明:“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⑧对历史的分析就要从对生产方式的分析入手。在此基础上霍布斯鲍姆指出,生产方式中有一些基本元素会使其不稳定,同时从外部而言,各种不同结构的社会间的结合与互动也有影响,这就决定了“所有的发展都是混合的发展”,^⑨并且是以政治经济学研究为基础的综合性的发展。

第三,他们都重视普通人民在历史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但具体的研究对象有所区别。霍布斯鲍姆认为,自下而上方法论的研究不仅仅是要去研究底层阶级的活动经历,而且要“恢复底层人民的理论天赋”,“底层阶级本身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发挥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他们不仅仅是历史的被动受害者”。^⑩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研究是以政治经济学为基底的,所研究的平民主要集中于资本主义生产活

动中具有主体性的劳动群体,因此工人阶级就成为马克思主义平民史观研究的主要对象,阶级斗争研究方法自然成为历史研究中最主要的方法。布罗代尔同样关注人在历史中的经历,在其代表作《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中有大量的人群描写。但与霍布斯鲍姆不同,布罗代尔并未从阶级的角度来思考这一问题,而更多是从地理、民族等角度来划分人民群众。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来看,这种前资本主义的划分方式既源于布罗代尔所关注的16世纪的世界发展史这一主题,同时也是基于他从地理时间、社会时间以及个体时间的维度来进行历史时间区分的研究维度。因此,虽然两位学者都强调普通人对于历史发展的推动,但他们对于主体所划定的范畴是不同的,这也导致二者的研究产生了截然不同的理论走向。

对世界近现代史展开历史唯物主义重绘

作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霍布斯鲍姆从来不是一位隐身书斋的经院式学者,他的理论研究一直以实践为指向。20世纪中期,学界内部关于史学研究方法论的讨论甚嚣尘上,外部世界政治局势的急剧变化也迫切需要科学的历史解释模式的出场。东西方阵营都意识到掌握历史模式解释权的重要性。以英美为代表的主流西方阵营学者希望在历史的解释过程中洗清资本主义背负的罪名,确立资本主义制度的永久性;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以及资本主义内部的一些左翼学者则试图说明资本主义制度只是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因自身所具有的无法克服的内部矛盾而必定会被另一种制度所取代。正如哈耶克所说,“人们对历史事件的看法却并非取决于客观事实本身,而取决于他们所能接触到的关于历史的记录和解释”,^⑧掌握历史解释的话语权,也就确立了自身阵营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权力结构与合法性地位,并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社会的未来走向。时局的变化加之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争议令霍布斯鲍姆意识到,无论是出于推进史学研究变革的学术责任,还是他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担当,都有必要通过一部有分量的作品,从历史唯物主义史学的角度,对资本主义出现以来的世界历史加以清晰、科学的阐述和分析。换句

话说,历史研究方法的讨论并不应仅限于理论框架中,而必须通过实践加以检验。

霍布斯鲍姆认为,马克思主义对于世界历史的解释方式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因为它不是仅从学术的角度出发去描述历史发展,而是直面现实,以改造世界、影响世界发展为旨归。他在《马克思主义史》的前言中援引了马克思的话:“迄今为止,哲学家只是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继而指出,“马克思主义,作为现代世界历史上最具有解释影响力的理论学派,它既是一种解释世界的有力手段,又是改造世界的有力方法”。^⑨在《社会科学的历史贡献》一文中,他更为详细地写道:“马克思的方法首先包括两个方面:第一,通过人类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它提供了一个历史转变的基本结构模式,在这种生产方式中,人们处于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之中,这种生产关系与某一物质生产力的发展的一定阶段相一致,虽然它们之间时而发生冲突。第二,它为人类的其他社会活动同社会的经济结构之间彼此的关系提供了一种解释模式”,“马克思的方法还包含了第三个方面,即有意识的人类活动与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变革之间的关系”。^⑩在这一思路的引领下,经历近半个世纪的写作周期,霍布斯鲍姆的“年代四部曲”——《革命的年代》(1962)、《资本的年代》(1975)、《帝国的年代》(1987)及《极端的年代》(1994)——相继出版,作为其思想的集大成之作,直观且清晰地将作者关于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史的研究展现在读者眼前。

作者在写作中以政治经济学研究为基础,将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特有的资本主义的胜利和转型作为中轴,^⑪分三个阶段描绘了19世纪前后的世界发展史。第一阶段“以兰开夏建立起现代世界的第一个工厂制度和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为开端,而结束于第一个铁路网的设立和《共产党宣言》的发表”。^⑫这一时期英国工业革命及法国大革命共同掀起了资本主义革命浪潮,并转而波及整个世界,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政权建立了对全球的统治,其思想和技术也令其他文明俯首称臣。这一阶段资本主义生产制度及社会公共制度的主要模型基本建立,同时无产阶级逐渐形成,“共产主义的幽灵”已经在欧洲徘徊。

第二阶段始于1848年“欧洲最后一次真正的革命”而止于1875年资本主义经济的突然下落。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工业经济大发展导致世界历史呈现了一边倒的趋势,“工业革命吞食了政治革命”,^⑤在资本的带动下世界看似在一往无前地快速发展,资产阶级代表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渗透到各个角落。然而未掌握资本的地区及人民却在所谓“进步”的大旗下被时代所抛弃。第三阶段截止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内部矛盾不断激化,资本主义危机不可避免地出现,资本主义转型势在必行。一战的爆发代表了“资产阶级所治所享的世界的终止”,也标志着“‘漫长的19世纪’的终止”。^⑥从三部作品的写作时间来看,前两部著作正完成于苏联积极进攻、美国战略收缩的阶段,虽然作者对苏联的许多做法不甚认同,但从其论述中体现出对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世界即将走向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心。然而20世纪80年代之后,苏联的发展形势急转直下,现实局势迫使霍布斯鲍姆调整了对社会发展走向的判断,《帝国的年代》显露了他的犹疑,认为自由资本主义已不复存在,但资本主义却可能以另一种形式而长期存在。

霍布斯鲍姆原本计划用3部作品对他所专长的研究领域——19世纪前后的世界历史——作尝试性概述,但随着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急剧变化,尤其是苏联解体等一系列事件使马克思主义受到广泛质疑,霍布斯鲍姆修改了原有的写作计划,撰写了《极端的年代》,从亲身经历出发,对20世纪世界史这个他曾长期保持距离的话题进行一番考察。^⑦在这部叙述20世纪发展史的作品中,作者希望证明,苏联的失败并不代表其他形式的社会主义便不可行,^⑧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决定了它最终会被社会主义所取代,当下普遍存在的资本主义是社会发​​展终极模式的观念意识是由统治阶级制造出来灌输给大众的,这一模式下的世界发展史也是如此,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的使命,就是要真正深入到社会现实去做调研,了解普通人眼中的社会发展状况,从而抓住主要矛盾,“向那些特别尖锐、最有争议的题目之中深入挖掘”,尽可能真实地还原社会历史。^⑨

这一系列作品是霍布斯鲍姆运用历史唯物主义

史学研究方法重述世界近现代发展史的代表性作品。首先,他的研究以政治经济学为基础,结合其他学科展开综合性的研究,努力在以资本主义发展史为叙述主线的前提下跳出西方中心论的框架,将苏联、第三世界等区域都纳入世界发展史的体系进行考察。与编年史作品不同,霍布斯鲍姆的写作并非将世界范围内已知的事件一一记叙总结,而是紧扣资本主义发展的主题,将其发展过程中最为突出的要素、最主要的矛盾、最明显的变化等作为划分章节题目的依据,目的在于分析资本主义的扩张本质、寻求无产阶级的未来出路,回到历史当中,以扎实的学术成果“了解和解释一个处于革命转型过程中的世界,在过去的土壤上追溯我们现代的根源”。^⑩一言以蔽之,就是力图解释当今的世界缘何而来以及向何处去的重大现实问题。其次,他突出作品的大众性,强调马克思主义历史既是书写人民的历史,也是为人民而写的历史。霍布斯鲍姆在四部作品的序言中一再强调,自己的作品是为了受过教育、有一定学识的普通读者而写,而不是仅供历史学所作,“社会为历史学家研究的课题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历史学家如能正确使用这些史料,就不应只为其他史家而写作”。^⑪因此他力求以清晰、朴素的风格写作,并尝试运用多种方法将学术作品转化成可读性强的通俗读物,用通俗而不庸俗的方式把马克思主义完整、准确地表述给大众。^⑫最后,作者毫不讳言自己作品所具有的政治属性。“年代四部曲”展现出霍布斯鲍姆极强的理论抱负,它不是对历史事件的简单记叙,而是通过对史料的分析为读者提供一种思维方式,剖析和批判资本主义发展实质的逻辑线索贯穿始终,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念与具体的历史事件相结合,通过“一种理论的展现”,使读者更好地接受历史唯物论的研究思维方式,打破西方中心论的刻板模式,以现代性的方式主动去思考和解释世界历史的发展的另一种可能,重新描绘了近现代世界历史的形成画卷。

霍布斯鲍姆理论的特质及其贡献

作为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中影响力最大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之一,霍布斯鲍姆与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的同事们一道,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历史学研

究之中,探索出一套历史唯物主义史学研究方法,对近现代世界史的发展做出了翔实的、令人信服的阐释,并在推进西方史学方法论现代性转化的过程中做出了较为重要的贡献。那么,在众多西方史学研究者当中,霍布斯鲍姆为何能获得如此关注呢?换句话说,霍布斯鲍姆的学术特质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第一,霍布斯鲍姆在研究中较好地处理了政治立场与学术立场之间的关系。霍布斯鲍姆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社会局势及思想观念都纷杂混乱的时代。从大的范围来看,大规模战争打破了旧的世界格局,二战结束后,无论是社会生产方式还是人们的思维观念都处于亟待重建的状态;从小的范围来讲,历史学领域乃至范围更窄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领域中也存在诸多分歧矛盾。同时,苏联作为社会主义龙头的地位在这一阶段也饱受质疑。一方面,战后不久,苏联认识到社会主义短时期内无法以革命的方式战胜资本主义,尝试展开与资本主义的联系及合作,这对于当时的许多马克思主义学者而言是一个难以接受的事实;另一方面苏联偏向于用经济决定论的方式阐释马克思理论,使马克思学说陷入被庸俗化理解的境地,在曲解了理论原意的同时也抹杀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实质,遭到了众多学者的强烈反对。因此,有不少左翼学者认为政治立场与学术立场事实上已无法兼容,为坚守学术立场而纷纷退党。面对混乱的学术场域,霍布斯鲍姆没有卷入立场之争,选择回归文本探索马克思的本源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强调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实质。基于对《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马克思恩格斯比较成熟的作品细致研读,他对唯物史观有了较为深刻、正确的理解,认为要深入到具体的历史事件中看待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将理论的研究学习和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史的解读有机结合起来。他一方面回应理论界当时比较有影响力的如新自由主义哈耶克等人对于马克思理论的质疑,另一方面也能较为清楚地厘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与庸俗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相似性与差异性,在坚持政治立场的基础上以文本为依据,开辟出一条清晰的以唯物主义方法论为主线的学术路径,推进理论的科学发

展。第二,发掘并践行了具体的、可传播的历史唯物主义史学研究方法,推动现代史学的总体性发展。这里涉及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学的贡献的问题。西方历史学界普遍认可马克思主义在推动史学方法论的现代性变革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但只是较为笼统地指出马克思主义的贡献在于其综合性的研究方法以及强调人的行为在历史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兰克史学能够在史学界具有革命性影响,就在于其倡导了“如实直书”的科学的研究方法,带动了历史学研究的整体发展,而马克思主义在历史学界的革命性贡献同样需要具体的研究方法的总结与推广。霍布斯鲍姆与学派的成员一道,探索出了以自下而上的历史观和阶级斗争分析方法为主体的历史研究方法,在倡导综合性、交叉性研究的同时特别强调了政治经济学对于历史学研究的基础性作用,在新的史学方法论的推动下,冲破了线性的思维模式,从空间、时间的双重维度对历史展开批判性的分析研究,从而使历史结构具有了动态性、生成性,推进20世纪史学研究的现代性发展。更加重要的是,霍布斯鲍姆将新的史学研究方式运用于史学研究之中,撰写了以“年代四部曲”为代表的大量学术著作,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影响,有力地证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及其有效性。

第三,弥合理论与现实的“缝隙”,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研究与大众化普及结合起来。20世纪60年代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较为明显地表现出理论研究与社会现实脱节的现象。一个较为典型的事例是,1968年5月,为纪念马克思诞辰150周年,巴黎举办了名为“马克思与当代科学思想”的学术讨论大会,与此同时,巴黎大街上正在进行轰轰烈烈的学生示威活动,但是会场上除霍布斯鲍姆之外鲜有学者提到这场学生运动,类似状况在当时并不少见。同时,学者们日益精深的学术讨论似乎也与普通人的生活无关,并不会对后者产生影响。霍布斯鲍姆一再强调,马克思主义史学所承担的任务不仅是要书写人民的历史,同时也要为人民书写历史,这种“脱节”极有可能带来的是对马克思主义史学根源性的伤害。霍布斯鲍姆认为,理论不仅要与现实的发展需要相结合,还要与大众的思想相结合。随着新的世界格局的

逐步建成以及工人阶级的不断成长,越来越多的无产阶级也获得了受教育的机会,普遍具有了读书和辨析时事的能力,他们是决定世界未来发展方向的主体,也因此,在普通大众中解释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史学观念也应当是唯物主义史学研究者的重点工作。正是看到了这一核心问题,霍布斯鲍姆的许多作品都不是为了专业的学术探讨而著,而是面向广大的受过一定教育的普通读者,他所讨论的现实具体的历史问题及其解释问题的视角引起了读者的兴趣与共鸣,而帮助他赢得广泛赞誉的“年代四部曲”恰恰就是这种富有现实性的、大众化的读物。

历史是我们理解过去、认识现在、预见未来的钥匙。习近平同志曾特别指出:“要尊崇历史、研究历史,确立历史思维”,“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当割断历史”。^⑤霍布斯鲍姆与其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提出要建构现代性的史学理论,其目的就在于打破西方中心论,在准确解释历史的过程中,用自己的学术话语辨析当下的复杂局势,对社会的未来发展给予更加科学合理的指导。这一思路与当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者来说是相通的。就理论观点而言,这位基于英国本土现实需要、依然无法彻底脱离资本主义学术框架体系影响的左翼学者的许多论断并不适应今天的中国发展,但是他作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在史学的现代性变革过程中所展示出的对建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强调、对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坚守以及理论研究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路,对于我们构建中国特色的史学理论体系依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注释:

①习近平:《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求是》2023年第2期。

②③⑥③① Harvey J. Kaye, *The British Marxist Historians: An Introductory Analysis*, Cambridge: Polity, 1984, pp.232-241, p.221, p.222, p.229.

④⑤①①⑦②③⑤③⑤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论历史》,黄煜文译,中信出版社,2015年,第310、322、51、217、225、220、317-319、249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80页。

⑧⑫ E.P. 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钱乘旦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第5、4页。

⑨张亮:《汤普森视域中的民族性与马克思主义》,《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7期。

⑩张亮:《阶级文化与民族传统:爱德华·P. 汤普森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85页。

⑬ E. J. Hobsbawm, "The Making of the Working Class: 1870-1914", *Worlds of Labour: Further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Labour*,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84, p.196.

⑭⑯ 钱乘旦:《世界历史研究的若干问题》,《历史教学》2012年第20期。

⑮⑰ 伊格尔斯:《历史研究国际手册》,陈海宏、刘文涛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1、10页。

⑱ Eric J. Hobsbawm, *Comment, Review, I*, 3/4, Winter/Spring 1978, pp.157-162. 该文后来以《英国史学与年鉴学派:一个注解》为标题收录于霍布斯鲍姆《论历史》(On History)中。

⑲⑳㉑㉒ 费尔南·布罗代尔:《论历史》,刘北成、周立红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5、52、66-69、16页。

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04页。

㉔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霍布斯鲍姆自传:妙趣横生的20世纪》,周全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第366页。

㉕《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4页。

㉖哈耶克编:《资本主义与历史学家》,秋风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页。

㉗ E. J. Hobsbawm, "Preface", *The History of Marxism: Volume 1: Marxism in Marx's Day*, Brighton: The Harvester Press, 1982, pp.vii-viii.

㉘ E. J. Hobsbawm, "The Contribution of History to Social Science",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 Vol.xxxiii, No.4 (1981), p.631.

㉙㉚㉛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帝国的年代:1875-1914》,贾士蘅译,中信出版社,2017年,第10、7、1页。

㉜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革命的年代:1789-1848》,王章辉等译,中信出版社,2017年,第64页。

㉝㉞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资本的年代:1848-1875》,张晓华等译,中信出版社,2017年,第3页,序言第v页。

㉟㊱㊲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1914-1991》,郑明萱译,中信出版社,2017年,序言第v页,第603页,谢语第vi页。

㊳ Richard J. Evans, Eric Hobsbawm: *A Life in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pp.396-398.

㊴ 习近平:《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 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求是》2022年第14期。